

交通压力巨大 深圳市长呼吁市民别买车

本报讯 “我呼吁在座的各位不要买车了！”4日，在深圳市民政工作会议上，市长许宗衡谈到民政工作进展现状时表示，深圳目前在医疗、医保、教育方面的工作力度很大，但交通压力也很大，今年全年新增汽车保有量预计达到20万辆。

市民提供的医疗、医保、教育资源的服务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交通方面面临的压力还很大，许宗衡表示：“我呼吁各位不要买车了，虽然这可能没有法律依据。”据透露，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新增汽车保有量已达到9万辆，预计全年达到20万辆。

据《南方都市报》

广东完善驾驶人培训机构体系 新司机撞死人 追查驾校责任

本报讯 4日，广东召开全省交通安全会议，广东将进一步完善驾驶人培训机构和教练员质量考核体系，建立新驾驶人安全信息反馈机制，建立优质驾校、教练员质量排行榜。

是考核驾校、教练员水平的重中之重。如果新司机发生亡人交通事故，还将追查驾校和教练员的责任。

“排行榜一出会不会又涨价？”刘辉介绍，学车价格早已放开，交由市场调节。而排行榜公开一段时间后，势必会让榜上有名的驾校报名人数增多，价格自然上涨。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排行榜公布后肯定会形成价差，但不会超过500元，对规模小的驾校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据《新快报》

全国750万台电脑染病毒 比去年同期增长12.2% 病毒新增23%

本报讯 4日，金山软件发布的关于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安全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感染病毒数750多万台，比去年同期增长12.2%。互联网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新增病毒样本增加23%。金山毒霸反病毒专家戴剑指出，经济利益已成病毒制造者最大的驱动力。据统计，目前国内约有4000万网用户，其中八成以上用户习惯在网上交易或炒股。随着网上交易人群的增多，QQ号码和网游账号等被盗事件频频发生。

据《京华时报》

《福布斯》发布最新榜单 最贵老板年薪1338万元

本报讯 《福布斯》杂志7月4日公布了新一期的“中国上市公司最佳和最差老板”榜单。思源电气董事长董增平名列“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老板”排行榜首位，海王生物工程总经理刘占军则位居“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排行榜首，而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则排在“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第六名。

据悉，《福布斯》排名针对A股中所有非国有上市公司，要求其首席执行官、总裁、总经理连续任职超过3年，排名依据为公司近3年间的业绩、相对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表现，同时考察在此期间高管领取的薪酬。

调查显示，过去3年间，入选“最佳老板”排行榜的25家企业的高管为股东带来了平均15.8%的净资产回报率，远远高于所处行业6.4%的平均回报率；而前3名高管在过去3年间的平均年薪为27.9万元，在2006年的平均年薪为38.5

万元。凭借着过去3年为公司创造的辉煌业绩，思源电气董事长董增平夺得“最佳老板”头名，成为最大“黑马”。

相对于“最佳老板”的骄人成绩，入选“最差老板”排行榜的10家企业的高管则表现糟糕，过去3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为-18.6%。他们所处行业的情况也不妙，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5%，但他们却领取着平均39.7万元的高额年薪。

海王生物工程总经理刘占军由于较低的“性价比”不幸被评为“最差老板”。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公司国际化转型“持久战”中的TCL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东生位列“最差老板”第六名。

除此之外，《福布斯》今年首度推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榜单，2006年，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以高达1338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夺冠。

据《北京晨报》



白天街头抢劫? 特警对抗演练!

7月4日，几十名北京市西城辖区特警大队为加强实战能力，进行道路截击、楼宇攻防战术等自我对抗演练。

新华社发

三人寻金迷失新疆戈壁 两人严重脱水 一人殒命

本报讯 3人进入新疆哈密伊吾县戈壁寻金迷失，当搜救人员找到他们时，两人严重脱水神情恍惚，另外一人已经死亡。

4日，记者从伊吾县警方了解到，7月1日上午，3名江苏人、两名伊犁人从伊犁驱车来伊吾县寻金。次日，大家商量两人留在宾馆休息，江苏人王树生、王全叔侄

和伊犁人张还(均为化名)驱车进入戈壁。10时许，当3人来到他们寻找的目的地后，便将汽车放置在一旁，徒步进入戈壁。

太阳逐渐升高，地面气温也开始上升，大家头昏脑涨。无意中，王树生、王全叔侄和张还竟分成了两队。天逐渐黑了下來，大家都没走出戈壁，手机也没有信号。

7月3日，王树生、王全叔侄在戈壁上继续行走，劳累、饥渴首先将王全叔侄击倒，王树生只好陪着侄子坐在地上休息。12时许，王树生发现手机突然有了信号，他赶紧打出了报警电话。报警后，叔侄两人睡着了。王树生醒来时，发现侄子已没有气息。

与此同时，获知情况的伊吾县政府已组织边防官兵、民兵、公安等百余人进入戈壁展开大规模搜救。

7月3日14时20分，搜救队员首先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还，7月4日15时30分，王树生叔侄二人被找到。据《都市消费晨报》

重庆115岁老人成世界第一寿星 家人欲为其申请吉尼斯纪录

本报讯 115岁的重庆老人范秀英比目前确认的“世界第一寿星”大一岁，家人欲为其申请吉尼斯纪录。

范秀英的户口和身份证上显示，老人的出生日期是1892年4月11日。“婆婆现在除了有点便秘，没有大的疾病。”61岁的孙子张庆豹介绍，“婆婆平常连感冒都很少。”因年纪大了，范秀英近年背驼得较厉害，行走时上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听力也严重下降。

张庆豹介绍，婆婆最大的爱好就是劳动。“婆婆90岁时，还每天挑水上楼。从不让人帮

忙。”以前每天早上，范婆婆还要坚持锻炼半小时。饮食方面，范秀英每餐要喝五钱白酒，但绝不会多喝。每天早晨要喝新鲜牛奶，喜欢吃鱼和老鸭汤。休息时间较有规律，早睡早起，中午坚持睡午觉。

“婆婆特别喜欢哭，属于性情中人。”在张庆豹印象中，只要稍有不顺心的事，婆婆眼泪就下来了。张庆豹说，根据范婆婆目前的身体状况，肯定还能活好多年，他们家人也在积极查询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的相关事宜，准备为老人递交申请。

据《重庆晚报》



7月5日，第三届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兰州开幕。展览共展出兰州傩面制作、兰州传统木偶剧等上百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新华社发

ZHENGZHOU DAILY 新闻时评

编辑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ynews.com

时政点击

牛肉面限价与空调使用立法

有两条关于消费的规定或规定意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条是兰州物价部门近日在“掂量”了“牛大碗”的轻重厚薄后首次限定：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0.2元，违者将严厉查处。另一条是“夏季室内空调不得低于26摄氏度”的规定，有望以国务院立法的形式得以确定。

网友对于两条规定多持反对意见。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这样的规定是否切实可行。比如：你规定了牛肉面的价格，你能规定牛肉面的分量和配料吗？你规定了室内空调的使用温度，你能对每一台室内空调进行监控吗？另一方面，网友也在质疑，政府对类似牛肉面价格、空调使用等这些本由市场本身决定的问题进行管理，是否会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规律。

应当说，网友的意见有其合理的地方。的确，牛肉面限价和空调使用都是一种宏观层面的规定，很难贯彻和执行到具体的细微之处。但是，规定和立法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为了执行，以规定和法规的形式来表明政府的态度，表达社会的期待，本身也是规定和法规的应有之意。

至于网友的第二点疑问其实是忽视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整的相对性。市场经济不是不要政府调控，而是需要正确的政府调控。所谓正确就是合适和及时，就是弥补市场调节的“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于牛肉面问题，当市场调整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普遍性需要时，政府应当出手。对于空调使用问题，当市场调整是在能源危急和环境堪忧的情境下进行时，也需要政府的出手。将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都是公共性极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忽略经济发展的公共性时，政府应当负起责任。

我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样的规定既适用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宏大的国计民生领域，也适用于牛肉面价格、空调温度设定等生活的细节。人们并不因为这些问题较小，这些问题更多依赖于道德去改变而否定了政府调控的必要性。衡量是否需要政府调控的标准是市场经济出现“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时，而不是问题的大与小。事实上，关系到民生时，根本没有小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对牛肉面进行限价和对空调使用温度进行限定都不是观赏性立法，都没有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产生干扰，从规定和立法表明态度的作用，以及规定和立法的公共性来看，这两个规定或规定意向都有其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没有这些规定或规定意向会比有更有利于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李劲强

呼吁捐助贫困大学生对错之辩

7月2日，教育部举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新闻发布会，透露了国家奖助学金覆盖面大幅扩大等一系列利好消息。但在这场网络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我们特别不提倡我们的媒体呼吁社会捐助贫困大学生。”

王旭明用惊人的语言干预媒体已不是第一次了，他的“媒体无礼论”曾让他曝得大名。作为资深教育界人士，教育上的事他肯定比一般人要知道得多，对贫困大学生的现状也应当有更深刻的了解。当今，在社会道德资源十分匮乏的窘境之下，也一直有溪流一般的道德力量的汇集。表现之一便是，一些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且有道德感的人，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一些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完成艰难的学业；更有那些有爱心的良善之人，在自

己生活不宽裕的情况下，也拿出钱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愁眉不展的学子尽一份微薄之力。不管提倡不提倡，社会上总是有一批这样的好人默默地做着只求奉献而不求回报的好事。一个媒体，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报道权吧？就是“呼吁社会捐助贫困大学生”，难道有什么不应该该而有什么错吗？

一个人不管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发言，所持之论也不能脱离现实之境。而从高台上下来做，总还要将心比心。眼下的情况是，国家的助学贷款政策，尚不能覆盖所有的贫困大学生。一户农民或一个工薪家庭，供一个孩子上大学，4年下来，不知要经受多少艰辛和内心的疼痛。有能力人的尽力所能及，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感。媒体呼吁人们捐助贫困大学生，这

是媒体在尽媒体之责，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拉一把那些艰难求学的学子，会多多少少减少一些社会的痛苦。一句“我们特别不提倡我们的媒体呼吁社会捐助贫困大学生”，意味很多。除了让人们看到教育制度的缺陷和无力外，也看到了一种人心被社会沙化侵蚀后所呈现的冷漠。

知识改变人的命运。上大学，现在依然是无数处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的梦想。虽然路径狭窄，但它毕竟还是一条学子们从底层向上走的路径。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也曾徜徉于大学校园，不知其家境如何，是怎样读完了大学。但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的他也是一个贫困大学生，对社会温暖有一定的期待，那他今天台上的发言还能是此一番腔调吗？

罗金羽



漫画：人狗混泳

昨天，家住某小区的刘英准备到小区公共游泳池“凉爽一夏”，只见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只白色宠物狗在戏水。她尝试劝说，对方却说：“这狗也是交了钱才进来的！”而物业处一工作人员则表示，公司暂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毕竟这属于业主的私事，不好过度干涉。

不过，如今的宠物除了猫猫狗狗，还有什么青蛙呀，老鼠呀，蛇呀，鳄鱼呀，大家都把这些宠物带去泳池，那一定热闹有趣，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小区的业主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图 小乔

北京广州肉价创新高应反思什么

北京、广州两市肉价再创新高，使刚刚趋于平缓的内价又起“风暴”。按理说，受市场调节的内价，根据供求关系上涨、下落都是比较正常的事。但是，此次肉价上涨，时间短、起伏大，对居民生活影响显著，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首先，为什么肉价上涨如此迅速？肉市不是股市，对肉市和肉价来说，如果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争等重大变故，应该相对平稳。即使出现价格波动，也不会波动很大。然而，这次的肉价上涨，却如股票一样，连续“涨停”，使广大居民一时无法适应。

第二，面对肉价的迅速上涨，有关部门的反应不可谓不快，除表态要稳定市场外，还立即成立工作组，派员到全国检查，并称准备启动应急机制等等。但是，各种举措，只是使市场肉价稍稍平缓了一段时间，立即出现了严重反弹，北京、广州等地甚至创出历史新高。反应迅速的背后，相关部门明显呈现出办法不多，力不从心之态。

第三，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到底放在什么地方？肉价出现迅速上涨，可以肯定地说，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爆发。而对生猪生产出现严重不足的苗头，为什么地方政府毫无察觉？我们知道，这些年，地方

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抓政绩、抓形象工程上了，招商引资、城市改造，甚至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公祭、修名人画像以及盖豪华办公楼等方面了，却少有人去过问农民养猪、市场供应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

肉价上涨问题，表面上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实则上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各级政府与部门仍然浮于表面，做一些只重形象、不重实效、只重宣传、不重实质的事，不仅仅是肉价，谁又能保证粮价、油价不出现大的问题呢？

艾琳

不能靠百姓下跪推进环保

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到安徽蚌埠鲍家沟检查，由于对当地政府部门污染久治不愈的现状失去信心，一群当地百姓跪倒在检查组面前，请求检查组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污染问题。据反映，当地村民为了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10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可就是不断地查不断地排污”。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人人因法律保护而平等，法律是公民一切权益的最后保障，任何公民都不该陷入以牺牲尊严来换取权利的境地。老百姓的腰杆是由法律撑着的，而安徽鲍家沟百姓这一跪，表明的不仅仅是这些普通公民环境维权的艰辛、无奈，这背后暴露的是环境执法、立法领域存在的严峻问题。

法律云，有权利就有保障，有损害就有救济。但和一般的权利损害比较，环境侵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加害方与受害方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对等。

比如，在经济上，污染受害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受损害后本已经济拮据，高昂的诉讼费用、律师费、鉴定费使用使他们难以支付；在诉讼资源上，污染受害者在信息、专业知识、技术等资源问题上，相对于污染企业更不具有优势。

而且，由于污染企业都是当地政府的利税来源，有的甚至是“支柱”企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甘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这样，受害者日益丧失对当地政府和法律的信心，环境违法者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按照环保总局官员的说法，目前环境执法中企业有“三不怕”：一不怕环境监察，二不怕环境处罚，三不怕老百姓造成损害；而一些地方政府又有“三不查”：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这样的社会逻辑下，环境受损的普通公民维权无路，甚至下跪求援，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完善立法：首先，要加大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根据我国现行《环保法》，企业违法排污，环保部门最多罚10万元，而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只能罚1次。这种处罚成本和污染企业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亿元的利益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违法成本明显低于守法成本，企业根本就不怕行政处罚。

其次，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审理案件贯彻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即未经起诉不得启动审判程序。然而，我国目前三种诉讼制度中(主要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关系到环境侵权诉讼的规定存在不足，导致此类案件的审判出现了盲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很显然，按照这一规定，环境侵权诉讼中，暂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管有无间接利害关系，也不管日后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能提起诉讼。在行政诉讼上，我国法律也特别强调原告是“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这也使环境侵权的行政行为有可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鉴于此，我国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现代型诉讼，它能给公众和被管理者提供以司法途径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并在相当程度上对环保政策的形成和环境立法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侯佳儒